



MATA獎的成長與改變

MATA賞の成長と変化

The Making and Changing of the MATA Awards

文・圖——蘇弘恩（導演、小花電影有限公司負責人、教育部「MATA獎」審查委員）

對我來說，MATA獎一直是有些遺憾的存在。遺憾的是，在我學生時期，沒有一個這樣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學生影像競賽，直到我即將畢業時，教育部才在2013年開始舉辦MATA獎。所以在我的導演生涯中，一直沒有機會拿到MATA獎的獎項。所幸，我跟它的緣分並沒有斷，我從2021年開始，被推薦擔任MATA獎的評審，也開始了跟這個影展長達四年的緣分。

緣起

2021年第八屆的MATA獎，是我第一次比較正式的擔任影像競賽評審，當收到這個邀約時，心裡是既期待又緊張，所以在看每一支影片時，都是保持著戒慎恐懼的心情。因為我知道，這些短短三分鐘以至三十分鐘的影像，都是同學們花費了許多時間去完成的結晶；同樣身為導演，就很能理解這種心情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好好的審視，被好好的對待。

當時的競賽項目只有分成非紀錄片跟紀錄片類，所以在討論得獎作品後，有些評審提出了臨時動議，認為非紀錄片類中，要包含短至三分鐘的動畫及接近二十分鐘的劇情片，這樣的長度落差太大；應該要在紀錄片類跟非紀錄片類中，再分出一組動畫類，才能夠讓這些作品有比較接近的競賽基準；而這個提議，也在下一屆（第九屆）的競賽中被付諸實行。當該屆競賽結束後，還發生了一個插曲：有一組得獎同學，因為版權爭議而被停權。這些注意事項，也在下一屆的競賽中被寫入規章。

重要變革

時間很快來到2022年第九屆的MATA獎，這一屆的評審過程，較之前多出了許多討論時間，顯見評審們更願意替自己心儀的作品爭取獎項。在評審會議結束後，我跟其中幾位評審提出了比較重大的臨時動議。第一點，過往的規章中，都會要求團隊中要有一



紀錄片《靈山》拍攝過程。

位原住民族的同學，來體現MATA獎呈現原住民族文化為核心的概念。但一位有在校任職經驗的老師就提出了看法：很多時候，這些原住民族的學生只是被找去充數，實際上並不是主創人員；在全民原教的概念下，應該是要讓非原民跟原民學生都有同等的創作機會。

這也直指一個原民影像千百年來的大哉問：誰有資格來拍攝原住民族題材呢？台灣的原住民族從過往被拍攝的對象，到1994年全景工作室好不容易培養出一群原民導演之後，原住民族終於自己拿起攝影機，拍攝自己的文化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，現在又要走回頭路了嗎？不是的，不是這樣的，做為一個導演，我絕對支持一個想法，只要你重視原住民族的主體性，尊重原住民族文化，那誰都有資格來拍攝族群影像紀錄。因此，我們都希望更改這個規章，只要拍攝的題材跟原住民族文化有相關，有學生身分就可以報名。

第二個重大的變革，則是從前幾屆就在討論的規則：如果作品已經在其他獎項得過獎，

那就失去參賽資格。原本這條規則的目的，看似保護學生權益，讓未曝光的作品有更多的得獎機會；但實際上，會限縮這個競賽的可能性跟競爭性。從實際面上來考量，台灣的學生會拍攝原民題材的數量本

來就很稀少，如果再設立這樣的排外條款，不僅會減少參賽作品的數量，更可能會失去很多優秀的作品。我跟另一個同為導演的評審都有一樣的想法，MATA獎即將要邁入第十屆，未來的原民導演們不能害怕競爭，應該要在品質上更加精進，才能夠面對更多的挑戰。

慶幸的是，在2023年第十屆的MATA獎競賽簡章中，這兩個建議均被採用，我們確實迎來了量多質佳的作品。也在這一屆競賽中，增設了高中職的影像企劃競賽，這樣由上至下的培育，讓高中學生可以從影像企劃開始學起，升

原本這條規則的目的，看似保護學生權益，讓未曝光的作品有更多的得獎機會；但實際上，會限縮這個競賽的可能性跟競爭性。





近幾年，政府開始重視全民原教，部落中也有許多返鄉青年，試圖從都市中回到部落，找到在部落中生活的方式；但要回去談何容易？而這些學生們的處境更是如此，雖然被要求要學習族語，但他們所在的環境又哪裡有用得到的機會呢？



科技不斷地在進步，但是作品始終關注的是人，到底怎麼樣的作品是符合時代需求的呢？

在理性面上，我們要不斷的對規章進行檢討，每一次的評審過程，如果出現任何不合理的狀態，那做為評審，就需要對主辦單位提出異議；也很感謝教育部的長官，在這個部分給



短片《土地》拍攝過程。



到大專時則可以有實際執行的能力，讓全民原教的概念，更加深耕且落實。至此，MATA獎的規章有了比較完整且合乎當代需求的改進，一直到2024年第十一屆為止，暫時沒有太大的變化。

與時俱進的競賽

我一直覺得影像競賽是需要與時俱進的，做為評審，我們一直在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，技術跟

我們評審很大的尊重，才讓MATA獎走到現在還可以不斷的調整跟進步；而在感性面上，做為評審的功課，就是要多多的去關注世界各地及台灣影展，培養並充實自己的美學。因為，我們的決定，都很有可能影響影展的審美取向，進而影響學生的拍攝方式。接下來，且讓我就參賽作品提出一些想法。

這幾年，我在看學生的作品時，常常會忍不住跟90年代的作品做比較，然後就會發現一些有趣之處。90年代的原住民族導演，像是阿美族的馬耀·比吼、泰雅族的比令·亞布等前輩，作品通常關注族群的社經狀況及社會議題，在幽默中會帶有濃厚的控訴性；到了我這個年紀，三四十歲的導演們，則有很多的作品會關注在文化的流逝及族群的變遷等議題，相較之下控訴性變弱了、關注個人的成分變多了；而近幾年的學生作品，則可以看到一個傾向，很多作品在問的是：「我是誰，我要去哪裡？」控訴性及社會層面的關注幾乎要消失不見，個人的成分卻變得更大。



蘇弘恩導演首部紀錄片《靈山》劇照。



蘇弘恩導演首部短片《土地》劇照。

結語

我覺得這些作品的傾向與演進，也象徵著當代社會的變化。早期，當我們的族人被誤解，社會上仍舊存在歧視的時期，導演們也就適時的提出批判，藉此替族人發聲，並對抗社會的不公義；到了2000年以後，歧視的狀況漸緩，但是文化的消逝卻顯而易見，族人們因為長久以來被要求像漢人一樣的生活，所以很多傳統的文化只能夠在老人的身上看到痕跡，為了要適應當代社會，也造成了很多族群文化從根本上發生了變異；這些狀態，也成了三四十歲的原民導演們，創作的主軸。近幾年，政府開始重視全民原教，部落中也有許多返鄉青年，試圖從都市中回到部落，找到在部落中生活的方式；但要回去談何容易？而這些學生們的處境更是如此，雖然被要求要學習族語，但他們所在的環境又哪裡有用得到的機會呢？於是，這些迷惘跟掙扎就成了創作主軸，被轉化在影像中。可以說，儘管是學生作品，也承載著對過去的警醒及對未來的啟發。

我無意比較這樣的變化是好是壞，僅僅提供我的個人觀察，我也很期待，之後有機會看到更多元的題材及特別的形式。擔任MATA獎評審，是我很珍惜的經驗，每次在評審時，都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年輕的思維跟脈動，對我個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幫助。而MATA獎做為全台唯一以原住民族議題為主的學生影像競賽，肩負著培育新生代原民影像工作者的重大責任，做為評審，我們也會扮演好監督者的角色。由衷祝福MATA獎能夠長長久久，與時俱進。◆



蘇弘恩

台北市人。1986年生。世新大學的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研究所碩士。現任小花電影有限公司負責人、導演、教育部「MATA獎」審查委員。曾任導演、東華大學兼任講師、慈濟大學兼任講師。身為原住民跟閩南人的混血兒，時常穿梭在兩種身份之間，所以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這個世界。目前專注於原民議題的創作。